

# 曹植遊仙詩探索

## ——兼論屈原對曹植遊仙詩的影響

廖堂智

### 【提要】

遊仙詩，顧名思義是一種描繪神人仙境的遠遊幻想文學，是魏晉時期主要的詩歌類型之一。《文心雕龍·明詩篇》：「正始明道，詩雜仙心，江左篇制，溺乎玄風。」說明了遊仙詩在魏晉六朝產生的現象，它是文人一時的創作題材，反映出詩人對當時政治、社會、人生種種的恐懼與慾望，以及他們內心種種錯綜複雜的情緒。遊仙詩人一方面致力創造並留戀於一種無憂永生的仙界，一方面卻又矛盾的對現實世界充滿留戀與不捨，故其主題常遊移在「登仙與回歸，仙境與現實」之間，成為遊仙詩作最大的特色。才高八斗的曹植亦不乏遊仙詩作，其數量更居父兄之冠，本文將以〈離騷〉、〈遠遊〉為本，詳細考校對屈原對曹植的影響，以及曹植遊仙詩裡反映出的內在情志。



【關鍵詞】魏晉文學 遊仙詩 曹植 屈原

## 一、魏晉時期遊仙詩興盛原因

### (一)、時局動盪的壓迫與道教思想的影響：

文體之興衰的一重要因素乃外在社會環境的推波助瀾，魏晉時期遊仙詩的大放異彩，與當時的動盪不安的時局，有著最直接的絕對關係。自東漢政治敗壞後的兩百年間，中原歷經黃巾之亂、群雄割據一直到三國分立、曹魏篡漢，這期間大小征戰連綿不絕，飢荒、瘟疫接踵而來，當時執政者高壓統治而動輒得咎，文人士大夫面對此一時代困局卻又無能為力，只好消極的藉由文字來抒發內心對當時禮制崩壞、政局動盪感到不滿，進而對生命產生一種長壽永生的渴求，於是飄渺虛幻、永恆極樂的遊仙詩，自然成為文人創作的最佳體裁之一，天馬行空各抒己懷，使的遊仙詩堪稱魏晉六朝最具時代意義的特殊文學，唐宋之後雖亦有佳作，但卻是因應道教思想興盛而起<sup>1</sup>，已和魏晉文人那種受時代壓迫而產生的極端「苦悶文學」有段距離了。

至於道教思想的影響方面，正如李豐懋先生在《憂與遊：六朝遊仙詩論集》裡所提到的，遊仙文學乃「一種道教中人在宗教情境中所『寫出傳世』(出世)的仙歌，它之不同於世俗的文人「創作」，就在於「真誥」式的筆錄，是修道者接遇仙真時，進入一種恍惚狀態的「自動」書寫。因此仙歌中所使用的仙言仙語只是一種「借用的符號」，也就是書寫者曾受過專業的藝文訓練，因而得以操作當時流行的五言詩體及詩語。<sup>2</sup>這裡清楚提到遊仙文學乃道教思想的一種抒發方式，是融合了宗教、神話後，對於前往「他界」(仙界)的一種強烈慾望，故遊仙文學是道教發展過程的必然產品，是文人心志發洩、寄託的飄然所在。

### (二)、帝王的提倡與文體本身的發展

漢朝樂府詩大盛，武帝好黃老長生之術，「上有所好，下必盛焉」，漢賦名家皆極盡賦體之浮誇詭麗，如司馬相如之〈大人賦〉的結構遣詞，就和屈原〈遠遊〉極其相似<sup>3</sup>。故漢賦有關於遊仙題材之作，多承襲屈原楚辭系的遠遊類辭賦，

<sup>1</sup> 道教出現於秦漢之際，遊仙詩即承襲樂府系的素樸仙說，並因應仙道體系的蓬勃發展，逐漸形成新風格。參見李豐懋先生《憂與遊：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6年)，頁25。

<sup>2</sup> 李豐懋《憂與遊：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6年)，頁12。

<sup>3</sup> 屈原〈遠遊〉：「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儻忽而無見兮，聽愴怳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司馬相如〈大人賦〉句末：「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

其內容、結構也頗多相似，而更極盡賦體誇飾奇麗之能力。

而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在政治上稱霸為王，在文學上亦各有極高造詣，放眼整個中國文學史，一門父子允文允武，而又能對當代文壇產生巨大影響的，可說是絕無僅有。他們除了寫下許多關懷民間疾苦的社會寫實詩外，亦不乏許多遊仙詩作傳世。「上有所好、下必盛焉」，父子三人身兼政治與文壇上的領袖，其下自有許多文人從善如流。因此才華洋溢的三曹父子，佐以門下優秀的文人雅士，發揮了眾星拱北辰般的效力，讓遊仙詩在當時大放異彩，成了主流文體之一。

文學之產生與發展是有跡可尋的，王國維《人間詞話》說：「四言蔽而有楚辭，楚辭蔽而有五言，五言蔽而有七言。古詩蔽而有律絕，律絕蔽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sup>4</sup>」遊仙詩之產生自然也有其脈絡可循，若就文體本身來溯源，屈原〈離騷〉的出現，乃遊仙詩濫觴源頭之所在。屈原因不見容於現實的環境，而虛構出一理想的天國世界：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

〈離騷〉<sup>5</sup>

而在〈遠遊〉裡，屈原因被放逐而怨恨自己生不逢堯舜之時，而產生遊仙出世的思想，為擺脫內心痛苦，他從心裡層面出發，更具體的寫出了中國第一首遊仙詩：

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

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羸穢除……。

〈遠遊〉<sup>6</sup>

王逸《楚辭章句》就說屈原「文采鋪發。逐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sup>7</sup>」，是屈原「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後之所

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恫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兩者之結構語句極為相似。

<sup>4</sup>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7年6月），頁3。

<sup>5</sup>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9月），頁26—29。

<sup>6</sup>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9月），頁164—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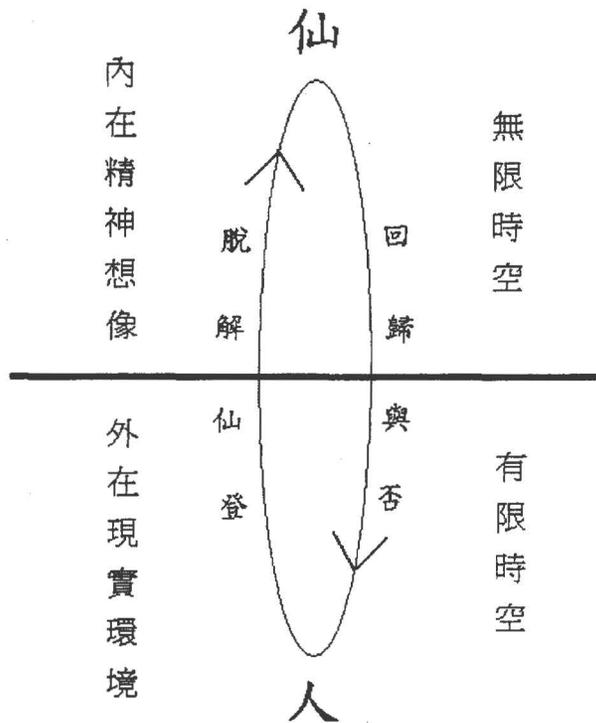
<sup>7</sup>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9月），頁163。

作。

除了屈原《楚辭》裡表現出來的遊仙思想外，莊子〈逍遙遊〉裡，也提供後人一種具體的「神人」、「仙人」描繪：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sup>8</sup>……。

這裡對於「神人」的居處、體態、飲食、起居、行為模式……等等，都做出了清楚的說明。而莊子這種超凡絕塵的神人描述與意識，無疑對後代各種仙神文學有著莫大的啓示與影響。



遊仙詩人一方面致力創造並留戀於一種無憂永生的仙界，一方面卻又矛盾的對現實世界充滿留戀與不捨，故其主題常遊移在「登仙與回歸，仙境與現實」之間，成為遊仙詩作最大的特色。

<sup>8</sup>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9月)，頁28。

## 二、遊仙詩溯源——屈原之〈離騷〉、〈遠遊〉

如前所言，若就文體本身來溯源，屈原〈離騷〉的出現，乃遊仙詩濫觴源頭之所在，全篇三百七十三行，兩千四百九十多字，是先秦以來人們將《詩經》與之相提並論的偉大詩作。若將全詩概分為三部分，則前半部是作者從自己純正的出身與崇高抱負寫起，中間部分則寫自己忠貞的政治理想與不和小人同流合污的堅決心志，並從而進入自我精神世界，神遊天地並與諸神傾訴的奇幻境界，藉由與眾神的互動反覆來重申自己對理想的追求，最後在追求不得失望之餘請神巫為其指引出路，而反映出去國隱遁與堅持理想的掙扎與矛盾，但終究還是不忍離開祖國，決定以死來明志回到現實世界結束全篇。而該詩以所以會被稱作遊仙詩之祖，乃在其中運用大量古代的神話與傳說，穿梭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空環境裡，打破天地、神人、仙凡的界線，構成了一片瑰麗奇特的幻想世界，可謂我國最早的魔幻（奇幻）寫實文學之先聲<sup>9</sup>，尤其詩中大量對於登仙的過程與對仙境神人的奇幻描述，成了後世遊仙作品爭相學習模仿的對象。在《楚辭》裡，屈原尚有許多突破仙人界限之作，而〈遠遊〉堪稱繼〈離騷〉外，最成功的遊仙詩作，相較於〈離騷〉，其體例更顯的精鍊短小、節奏明快，且著重在遊仙過程的描寫，故〈遠遊〉不僅是屈原個人情志的冒險神話<sup>10</sup>，同時也是中國騷人墨客創作遊仙詩時難以跳脫的經典範例。王逸注《楚辭章句》時說：「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sup>11</sup>其中談到作者的遠遊動機，以及作者理想抱負的堅持，然而對中國遊仙詩的發展與創作而言，其中「文采鋪發。逐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才是價值之所在，屈原對打破時空界線的超自然經驗描寫，即是遊仙詩創作的先聲，經過千年的醞釀，才在魏晉發酵而大放異彩。若再以兩者作比較，筆者認為〈遠遊〉之字數約略為〈離騷〉之半，其架

<sup>9</sup> 何謂魔幻寫實？托多絡夫在其《奇幻文學導論》裡，將奇幻文學細分成「詭異、驚悚、偵探、神奇、鏡像觀察、鬼魅、夢境、潛意識、主客異（易）位（第一人稱／第三人稱／你／我）、人物雙重性格／身份和時空分隔……」等等元素的敘述描寫。巴克斯在《奇幻文學與藝術》裡則舉出文學與繪畫的奇幻理論和實踐，點出魔幻寫實文學「奇」、「魔」（超自然／靈異／鬼魅）、「虛／幻」（夢境、潛意識）的特色。見張淑英：〈專輯弁言——生死如來去，夢幻映真實〉，《中外文學》2002年10月第31卷第5期，頁13。筆者認為屈原《離騷》裡超越時空、打破神人界線的超自然寫實手法，可謂中國魔幻寫實文學之先聲。

<sup>10</sup> 神話學者喬塞夫·坎伯在《千面英雄》裡，將古今中外的英雄神話歸納出「召喚→啓程→歷險→歸返」為基本架構，筆者以為魏晉遊仙詩中亦不乏類似該神話架構之作。見喬塞夫·坎伯《千面英雄》（台北：立緒文化出版，1992年8月）

<sup>11</sup>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9月），頁163。

構若以「出遊動機、出遊心境、遊仙過程、遊仙所見」也都極為類似，甚至其中也有相同詞彙之使用，其差異大概在兩者最後結果有所差異罷了。蓋〈離騷〉以「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作結，乃是作者追求理想不成後，決定相從殷代賢臣彭咸投水死諫之作法，此舉雖將作者懷憂遠遊的忠貞精神推展至極致，但仍可說是以悲劇收場。而在〈遠遊〉裡，作者最後寫道「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倏忽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作者此時超脫時空環境的界線，其感官經驗也以到了「視而無見、聽而無聞」的境界，如同莊子「破生死」般，最後作者寫道他「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超然進入無為境界，超凡脫俗的進入天地初創的泰初之境，此時他的精神已然超脫並與天地合一，不若上述〈離騷〉遊仙之後仍執著己念，終究不免再墜入塵世而無法自拔。而這種「登仙」後是否「回歸」的掙扎，亦是魏晉遊仙詩多所著墨的課題，而這當與作者的「遊仙動機」有相當關係，下章將論述曹植的遊仙詩，筆者將以屈原〈遠遊〉為例，說明屈原對曹植的影響外，也將一並點出作者遊仙詩裡，那種「出世或回歸」的矛盾所在。

### 三、曹植和屈原遊仙詩的對應

#### (一)、體法結構與辭句語彙的詮釋方法

曹植流傳至今的作品，最主要的是詩賦，約有詩八十餘首，辭賦四十餘首，而其中的遊仙詩數量更是居父兄之冠，然而曹植在〈贈白馬王彪〉一詩中及明白說道「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sup>12</sup>」，在〈秋思賦〉裡說「居一世兮芳景遷，松喬難慕兮誰能仙？」可見他和其父兄一樣，並不相信神仙之事<sup>13</sup>，他甚至在〈辯道論〉中對於方術之士深惡痛絕，斥之為「接姦詭以欺眾，行妖惡以惑民<sup>14</sup>」，其反感之深，遠過其父兄。那又是什麼原因讓他寫出大量鋪排整齊的遊仙詩呢？此即當從他的性格、遭遇以及人生價值觀去作探索了，而欲觀察其遊仙詩受屈原之影響程度，當從體法結構與辭句語彙去著手，故以下將試圖對曹植遊仙詩內容結構做粗淺分析，並著重其遊仙詩句裡「文辭運用特色」、「意象表現」來做探討，藉以推敲出曹植遊仙詩承先啓後之所在。

<sup>12</sup> 王述唐，《曹魏父子詩選》（台北：仁愛書局，1984年），132頁。

<sup>13</sup> 《昭明文選》卷24李善註曹植的〈贈白馬王彪〉時，引了曹操兩句〈善哉行〉軼文：「痛哉世人，見欺神仙。」曹丕〈折楊柳行〉則說：「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于今竟不還，王喬假虛辭，赤松垂空言，達人識真偽，愚夫好妄傳。」更是直接了當說明神仙事之虛妄。

<sup>14</sup> 黃守誠《曹子建新探》（台北：雲龍出版社，1998年9月），頁272。

曹植描述遊仙文學意象的詩作，可歸類為下列四種形式<sup>15</sup>：

1、題為遊仙，內容亦為遊仙。

如〈遊仙篇〉。

2、題非遊仙，內容實為遊仙。

如〈遠遊篇〉、〈磐石篇〉、〈升天行〉、〈仙人篇〉、〈五遊詠〉、〈平陵東行〉。

3、題非遊仙，內容亦非遊仙，但詩句中卻夾雜反遊仙思想。

如〈贈白馬王彪〉裡：「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神仙，松子久吾欺。<sup>16</sup>」又如〈辯道論〉對仙神之事更是做出「挾姦宄以欺眾，行妖隱以惑民」的駁斥。

4、題非遊仙，內容亦非遊仙，但詩句中夾雜神仙思想或事跡。

如〈苦思行〉、〈桂之樹行〉、〈飛龍篇〉、〈驅車篇〉。

若就現存的遊仙詩數量而言，曹植遊仙詩的質與量皆明顯勝過其父兄<sup>17</sup>，而這些詩作或是天馬行空的純粹想像，或是意有所指的比興寄託，都擴大豐富了先前遊仙詩的結構與意境，以下筆者將以〈遠遊〉為例，嘗試說明屈原對曹植遊仙創作之影響，先觀其〈遠遊篇〉<sup>18</sup>：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承浪相經過，  
靈鼈戴方丈，神嶽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  
瓊蕊可療飢，仰首吸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  
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  
金石固易敝，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後世皆云該篇係仿屈原之〈遠遊〉而作，王逸注〈遠遊〉時說該文：「文采鋪發，逐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sup>19</sup>」屈原遠遊的動機誠如王逸所言：「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意中憤然。」是因為不見容於當朝政治而懷忿遠遊他方，但曹植或因身份敏感而直接不點出他「遠遊」的動機，只是含蓄的說

<sup>15</sup> 本文所採用曹植之遊仙詩篇，乃以王述唐之《曹魏父子詩選》為本。

<sup>16</sup> 晉·陳壽撰 宋·裴松之注《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台北：頂文出版社，1980年），頁565。

<sup>17</sup> 按現存曹操詩作共23首，遊仙之作佔了7篇，而曹丕的遊仙詩作現存可考者僅有一首〈折楊柳行〉。

<sup>18</sup> 王述唐，《曹魏父子詩選》（台北：仁愛書局，1984年），168頁。

<sup>19</sup>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9月），頁163。

明出「中州非我家」，就直接將他遠遊場景設在遊仙途中來作開始。另一不同則在屈原遠遊方式是「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以其超脫的精神由下而上達天界仙境，曹植的遠遊場景卻是自四海出發，並具體的寫出所看到的大魚、靈鼈、仙人與玉女。屈原「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sup>20</sup>，曹植則同樣寫「瓊蕊可療飢 仰首吸朝霞」，接著他到達《山海經》所載，即千百年來人們心中的極樂西方仙境「崑崙山」，如同屈原在帝都見到了「句芒<sup>21</sup>」、「太皓<sup>22</sup>」、「蓐收<sup>23</sup>」、「文昌<sup>24</sup>」、「雨師<sup>25</sup>」、「雷公」、「炎神<sup>26</sup>」、「顓頊<sup>27</sup>」、「黔羸<sup>28</sup>」……等等仙界諸神，曹植也在崑崙山上見到了「東父<sup>29</sup>」仙人。在崑崙仙界裡，曹植「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自得逍遙，最後點出了他的願望「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即使是「萬乘」大國之君也不如他，達到永恆的安樂滿足。

其實就結構與意境的完整性而言，〈五遊詠〉<sup>30</sup>更可謂曹植遊仙詩裡最成熟的代表作品：

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逍遙八紘外，遊目歷遐荒，  
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華蓋芬曖藹，六龍仰天驤，  
曜靈未移景，倏忽造昊蒼，閭闔啟丹扉，雙闕曜朱光，  
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樞，群后集東廂，  
帶我瓊瑤佩，漱我沆瀣漿，踟躕玩靈芝，徒倚弄華芳，  
王子奉仙藥，羨門進奇方，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

在〈五遊詠〉裡，曹植的遠遊動機、準備過程、登仙載具、登仙過程、所見事物、最後結果，比之前述名為〈遠遊〉的遊仙詩，其結構更像遊仙詩之祖，即屈原的〈遠遊〉篇。

詩中曹植遠遊的動機是因為「九州不足步」，蓋為其政治上的鬱鬱不得志而來，這和屈原「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的原因是一樣的，至於遠遊前的準備工作屈原是「朝濯發于湯穀兮，夕晞餘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他如同仙人般「吸取日月精華」來洗滌身心，而曹植同樣也是「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作為登仙之準備。至於「登仙之載具」兩者皆是藉由遊歷天地間的神物「龍」來完成，屈原寫道：「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

<sup>20</sup>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9月），頁166。

<sup>21</sup> 句芒，即中國神話傳說中的木神，他輔東方天帝，掌管春天。

<sup>22</sup> 太皓，即中國神話傳說中的東方天帝伏羲氏。

<sup>23</sup> 蓐收，即中國神話傳說中的金神，他輔西方天帝，掌管秋天。

<sup>24</sup> 文昌，敕百官之星官。

<sup>25</sup> 雨師，即雨神。

<sup>26</sup> 炎神，即中國神話傳說中的南方天帝。

<sup>27</sup> 顓頊，即中國神話傳說中的北方天帝。

<sup>28</sup> 黔羸，即中國神話傳說中的造化之神。

<sup>29</sup> 東父，指東王公，傳說中的仙人名。

<sup>30</sup> 王述唐，《曹魏父子詩選》（台北：仁愛書局，1984年），201頁。

透蛇」，曹植則是「華蓋芬晻藹 六龍仰天驤」，而雙雙達到「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屈原）與「曜靈未移景，倏忽造昊蒼」（曹植）的效果。到仙境前，兩者也都有作為仙凡交界的「天門」的描述，屈原挾著前述的悲憤氣勢，直接「命天閭其開關兮，排閭闔而望予」，曹植則預期仙境早有「閭闔啟丹扉，雙闕曜朱光」的歡迎場面等著他的到訪。屈原從遊仙前「見王子而宿之兮，審一氣之和德」遇到王子喬向他請教登仙之道，到後來終於能上到天庭「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在仙境裡輾轉求見東西南北四方天神。曹植同樣寫道他「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楹，群后集東廂」在天庭裡遇見諸神，並且說「王子奉仙藥 羨門進奇方」見到了傳說中的王子喬給予他仙藥。到了最後是遊仙的結果，屈原是「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倏忽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

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sup>31</sup>」他求道成功，窮盡天地四方，而達到「眼不見、耳不聞」的超然境界，與自然天道合而爲一，彷彿回到天地初設的泰初階段。曹植則在天庭仙界「踟躕玩靈芝 徒倚弄華芳」快樂逍遙，並達到他「服食享遐紀 延壽保無疆」超脫凡俗的生死界線，而完成他與天地同壽的永恆願望。

以上係以曹植之〈遠遊篇〉與〈五遊詠〉爲例，對照屈原〈遠遊〉來說明曹植的遊仙詩體法結構與辭句語彙受屈原影響之所在，除外在前述曹植的其他遊仙作品如〈遊仙篇〉、〈磐石篇〉、〈升天行〉、〈仙人篇〉、〈平陵東行〉、〈苦思行〉、〈桂之樹行〉、〈飛龍篇〉、〈驅車篇〉……裡，也可見到相似的手法，以下再嘗試歸納出曹植遊仙詩文辭運用的特色，來說明曹植與屈原〈離騷〉、〈遠遊〉之相承關係：

文辭運用之異同	曹植遊仙詩	屈原〈離騷〉、〈遠遊〉
仙人、神人	仙人、玉女、東父、術士、湘娥、河伯、韓終、王喬、松喬、王子、王父、文昌、上帝、真人、隱士、神皇	羲和、雷師、宓妃、靈氛、真人、韓眾、軒轅、王喬、王子、句芒、太皓、風伯、西皇、文昌、雨師、祝融
仙境居所	崑崙、蓬萊山、太虛、閭闔、王母廬、五嶽閒、軒轅氏、九天、昊蒼、天衢、蓬萊、太清	九天、扶桑、閭闔、崑崙、帝宮、雷公
仙境器物	琴瑟、笙竽、玉樽、霞衣、霓裳、瓊瑤、沆瀣、仙藥、玉臺	沆瀣、鼓瑟

<sup>31</sup>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9月），頁174—175。

動物	大魚、靈鼈、玄豹、神魚、白虎、六龍、飛龍、白鹿、螭龍、鯨	騏驎、玉虬、馬、鳳鳥、瑤象、玉鸞、鳳皇、八龍、玄螭、蟲象、鸞鳥
植物	瓊蕊、蘭桂、玉樹、靈芝、綠蘿、芝草、松	江離、辟芷、秋蘭、申椒、菌桂、杜衡、芳芷、木蘭、秋菊、薜荔、紉蕙、茹蕙、瓊枝、瓊茅、蘭芷、荃蕙、椒蘭、赤松、
登仙方法	乘蹻、驅風、乘六龍、奮六翮、舉翅飛、乘颺	駟玉虬、駕飛龍、駕八龍、承風

## (二)、出世或回歸的掙扎——曹植遊仙詩裏的內在情志

詩裡的意象係指在作者的主觀意識中，被選擇的記憶、經驗重新組合組織後再傳達給讀者，以造成暗示、象徵的閱讀效果。因此，作者的「象」如何巧妙精準的傳達出欲表現予讀者的「意」，決定了詩品的高低。詩人為了表達情感，按照一定的構思，根據審美形式規律，將一個個意象進行組接和排列。曹植的遊仙詩承襲屈原楚辭系的創作語彙，利用大量瑰麗的意象符號，大抵依「遊仙動機 → 遊仙準備 → 遊仙過程 → 遊仙所見 → 登仙極樂 → 回歸與否」的創作步驟，傳達出作者內在情志的意念，然而曹植是否真以遊仙得道後的永恆常樂為滿足？論述此一問題時，則需由作者的創作動機來談。

屈原在〈離騷〉和〈遠遊〉裡的遊仙動機相似，但在「登仙」後卻了有不同的選擇，〈離騷〉以「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作結，〈遠遊〉則以「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作結，前者在遊仙後卻仍選擇悲觀入世，後者在遊仙後則無為出世。如此相似的詩體，卻有著迥然不同的結果，但既使屈原真如傳說所言投水自盡，我們也不能以結果遽言作者言不由衷，吾人非屈原，無法想見詩人完成〈遠遊〉後的心境究竟為何？作品一旦脫離作者呈現在世人面前後，就可被視為獨立的生命體，留待讀者精品細讀隨之俯仰了。然則我們是否也可藉由檢視作結的詩句，來同理研判曹植的內在情志？以下嘗試將曹植遊仙詩作裡的遊仙動機與作結詩句作一整理：

遊仙動機	作結詩句	詩篇名
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	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遠遊篇〉
	願得紆陽轡，迴日使東馳	〈升天行〉
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	徘徊九天上，與爾長相須	〈仙人篇〉
	北極登玄渚，南翔陟丹邱	〈遊仙篇〉

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	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	〈五遊詠〉
	靈芝採之可服食，年若王父無終極	〈平陵東行〉
我心何踴躍，思欲舉雲追	策杖從吾遊，教我要忘言	〈苦思行〉
得道之真人，咸來會講仙	高高上際於眾外，下下乃窮極地天	〈桂之樹行〉
我知真人，長跪問道	壽同金石，永世難老	〈飛龍篇〉
	同壽東父年，曠代永長生	〈驅車篇〉
我本太山人，何爲客淮東	仰天長太息，思想懷故邦，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	〈盤石篇〉

由上述「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等等遊仙動機，與「同壽東父年，曠代永長生」、「徘徊九天上，與爾長相須」……等等的作結詩句，可概知「追求永恆的無憂極樂」似乎是曹植遊仙詩作的表面理由，然則事實果真如此？曹植一生，可以黃初元年爲界，分成前後二期，其詩歌亦然。黃初以前，得父寵愛，生活放蕩任性，其〈與楊德祖書〉<sup>32</sup>中自言：

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故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留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

可見當時之志趣本在實現其政治抱負，並不以文學創作為積極取向。黃初元年，曹丕稱帝，曹植開始步入後期悲慘生活，政治上屢求試用而不可得，觀陳壽《三國志》，陳思王植對其帝兄魏文帝丕言：「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愿王勿疑……，竊揆之于心，常愿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擲舒蘊積，死不恨矣……。』」<sup>33</sup>〈七哀〉詩裡又說：「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sup>34</sup>雜詩六首之一則寫道：「翹思慕遠人，願欲托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凡此種種，在在說明曹植政治上之鬱鬱不得志，魏志說其「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結束他悲苦的後半生。

<sup>32</sup> 劉維崇《曹植評傳》（台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1977年2月），頁208。

<sup>33</sup> 晉·陳壽撰 宋·裴松之注《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台北：頂文出版社，1980年），頁572。

<sup>34</sup> 王述唐，《曹魏父子詩選》（台北：仁愛書局，1984年），114頁。

政治上的不如意，讓曹植在現實生活中舉步艱難不得伸展，發出「九州不足步」、「中州非我家」的無奈感慨，進而促使他遊脫塵世，到另一精神世界去寄託苦悶的心靈。因此，外在惡劣的政治環境是構成了曹植遊仙動機最大的外在因素。然而曹植在精神上是否真能滿足於「帶我瓊瑤佩，漱我沆瀣漿，踟躕玩靈芝，徒倚弄華芳」的極樂仙境？蓋遊仙詩人多一方面嚮往無憂極樂的永恆仙境，一方面卻又對紅塵俗事無法割捨，不免徘徊於遊仙與入世的矛盾選擇裡。現實的痛苦與不如意，讓詩人營造出一個非人間的神仙世界來解脫現實的痛苦，但這種現實的痛苦又恰巧是因為生命的短暫無常和慾望的難以實現，當這種掙扎達到極點時，往往讓詩人激發出更強烈的求生動機，早在東漢後期的〈古詩十九首〉就提供了這樣了概念：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紬與素<sup>35</sup>。

代表曹植的遊仙詩之一的〈驅車篇〉，很明顯即受到〈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的影響，然而起始的體例結構雖然相似，卻沒相同的結果作結，不同於〈古詩十九首〉裡「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的體認，在〈驅車篇〉裡，曹植嚮往的仍是「同壽東父年 曠代永長生」的永恆仙境。此時不禁讓人懷疑曹植是否真的已在遊仙詩裡獲得解脫？若不能於精神層次上獲得遊仙的滿足，又無法放任自己及時行樂，曹植將何去何從？

在〈贈白馬王彪〉裡曹植已說：「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黃初五年令〉裡說：「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神龜賦〉裡說：「天道昧而未分，神明幽而難燭，黃氏沒于空澤，松喬化于株木。」以上在在可證明曹植根本不信什麼神仙之事，他甚至寫了〈辯道論〉措辭強烈的認為神仙之事乃「挾姦宄以欺眾，行妖隱以惑民」般虛妄荒誕而不可信。因此，我們可證明曹植大量遊仙詩作裡對生命永恆長壽的追求，僅能作表面解釋，隱藏在背後的，仍然是他「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的入世企求，而一首首的遊仙詩作，正是詩人旺盛生命力的澎湃展現，如前所提及，神話學者喬塞夫·坎伯經典名著《千面英雄》裡，將古今中外的英雄神話歸納出「召喚→啓程→歷險→歸返」為基本架構，筆者以為魏晉遊仙詩人「遊仙動機 → 遊仙準備 → 遊仙過程 → 歸返與否？」的情節結構與該神話架構之

<sup>35</sup>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7年6月），頁101。

作不謀而合，曹植將他出世遊仙的精神，轉化為積極的入世關照，他在〈盤石行〉裡得作結詩句「仰天長太息，思想懷故邦，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迥異於其他遊仙詩作，是唯一赤裸表現其內心理想志趣的「洩密」之作。「我本太山人，何為客淮東？」是不被見用的遊仙動機，但能因此如孔夫子所言：「道不行，承桴浮於海」嗎？一如王逸所言曹植「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他終究不忍拋棄所堅持的理想，不像屈原〈離騷〉選擇「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悲觀入世，也不像屈原〈遠遊〉選擇「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無為出世，即便政治環境再如何惡劣，仍不改曹植以一首首的遊仙詩作來證明自己樂觀入世、雖千萬人吾往已，至死方終的決心啊！

#### 四、結論

大抵以「遊仙動機 → 遊仙準備 → 遊仙過程 → 遊仙所見 → 登仙極樂 → 回歸與否」為創作步驟的遊仙詩作，反映出詩人對當時政治、社會、人生種種的恐懼與慾望，以及他們內心種種錯綜複雜的情緒，遊仙詩人一方面致力創造並留戀於一種無憂永生的仙界，一方面卻又矛盾的對現實世界充滿留戀與不捨，故其主題常遊移在「登仙與回歸，仙境與現實」之間。因為魏晉時局動盪的壓迫、道教思想的持續發展、文體本身的發展，以及帝王的提倡……等等因素，使得魏晉時期的遊仙詩大放異彩，成了當時文壇的代表性文體之一，遊仙詩至唐代雖而於詞語結構上更見成熟，但相較之下卻無魏晉文人那種因時代壓迫，而對生命價值所產生的那份真實的真情流露。才高八斗的曹植亦不乏遊仙詩作，若就文體本身的發展來考校，即可發現曹植遊仙詩明顯上承屈原楚辭系的文學源流，然而曹植並不以遊仙得道後的永恆常樂作為滿足，反覆觀察曹植的詩文，即可發現曹植根本不信什麼神仙之事，不依屈原〈離騷〉選擇「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悲觀入世，也不若屈原〈遠遊〉選擇「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無為出世。他明知勢不可為，明知政治環境惡劣，但卻仍積極持續散發他建功流名的生命熱量，隱藏在大量追求長壽永恆遊仙詩作背後的，竟仍是他「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的入世企求。因此，曹植遊仙詩作的詞彙語句或許多承襲屈原而來，但其「明知不可而為之」其積極精神卻已遠超越最後投江自盡的三閭大夫，留給後人無限感慨。

## 參考書目

- 晉·陳壽撰 宋·裴松之注：《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台北：頂文出版社，1980年）
- 梁·劉勰著 王庚生注：《文心雕龍》（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
-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9月）
-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9月）
- 王述唐：《曹魏父子詩選》（台北：仁愛書局，1984年）
- 黃守誠：《曹子建新探》（台北：雲龍出版社，1998年9月）
-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7年6月），頁3
- 李豐楙：《憂與遊：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6年）
- 張鈞莉：〈從遊仙詩看曹氏父子的性格與風格〉，《中外文學》，1991年10月
- 駱水玉：〈論魏晉詩歌中的遊仙意識〉，《國立編譯館館刊》，1998年6月
- 張淑英：〈專輯弁言——死生如來去，夢幻映真實〉，《中外文學》2002年10月第31卷第5期。